

创新与创业

创业企业如何塑造农村三产融合长效机制

——基于两种模式创业企业的跨案例研究

项伟莉¹, 李晗冰², 展 望²

(1. 吉林师范大学 图书馆, 四平 13600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在产业发展系统性上还存在不足,如何形成一个多主体参与下的农村三产融合长效机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基于产业发展模式不同的两个村庄,研究聚焦于农村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分析了“外来型”与“内生型”两类企业及其他相关参与主体在其中发挥的行为作用。研究发现:“内生型”企业与“外来型”企业相比在发展融入阶段更容易基于信任累积实现融合,乡贤在修正“外来型”企业偏差的同时,引导“内生型”企业沿产业链扩展升级。随着产业的发展,两种创业模式进入价值赋能阶段,逐步形成外生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制。在三大机制的作用下,农村可以形成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可为巩固脱贫成果并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 创业减贫;三产融合;长效机制;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DOI 编码:** 10.7511/JMCS20260106

0 引言

现在,中国已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是指导两大战略实践的现实需要,是两大战略目标一致性和内容重叠性的逻辑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政策学的理论需要^[1]。为了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国政府连续对乡村振兴进行关键部署。其中,产业兴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2],是实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基础。在脱贫攻坚时期,产业扶贫以产业集聚为依托对贫困地区进行区域化布局,通过产业链建设推动地区的产业振兴,为农村一

产、二产、三产的产业融合(简称三产融合)奠定坚实基础。具体来说,创业企业通过发挥创业减贫优势,在促进三产融合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创业企业可以结合当地客观发展条件着力构建资源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产业体系,将新技术、新要素、新业态不断向农村渗透、融合,在杜绝产业发展千篇一律的前提下,有效地保证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产业旺则乡村兴,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是产业融合^[3]。保持农村创业企业的活力,持续发挥创业减贫的作用对于推动三产融合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总结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典型案例,构建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对于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

收稿日期: 2024-0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基因赋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22CJY025)

作者简介: 项伟莉,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李晗冰,通讯作者,男,河南南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农村经济, E-mail: kloseli@vip.163.com;展 望,男,山东平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此,本文以村庄创业减贫实践为切入点,将产业扶贫、产业链延伸到三产融合过程整合到一个故事线,并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文试图解答不同模式的创业企业如何塑造三产融合长效机制这一核心问题。

1 文献综述

1.1 三产融合的内涵和中国实践

农村三产融合是以农业为依托,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扩展产业范围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业态^[4],在促进我国农业增效、农村居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等方面被寄予很高的期望。

近年来,学术界针对农村三产融合的关注持续深入,主要集中在融合模式、效应及水平评价等维度。在模式探讨上,当前的融合路径主要包括农业内部的产业整合、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以及现代技术向农业领域的渗透与融合。在融合效应层面,学界普遍认同农村三产融合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三产融合不仅可以逐步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形态与利益联结机制^[5],而且通过发挥农业多元功能、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优化要素配置,可以借助产业链延伸吸纳剩余劳动力,有效带动农民增收^[6]。此外,三产融合也被认为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7]。在融合水平评价方面,部分研究构建了涵盖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服务业与农业融合、经济社会效益等多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流通、生产、分配等环节,对农村产业融合程度进行了量化评估^[8]。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归根结底要对农村的土地及各方面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进行有效集聚和整合。土地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实现土地规模化生产及合作社经营,鼓励农户通过土地流转,以土地、资金入股企业等增加收入^[9],农村居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整合起来的土地可以发展成为特色农业产业基地。要实现农村产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以信息披露机制、激励相容机制和自增强机制为核心的“居民—土地—产业”

一体化协同机制^[10]。

1.2 创业减贫理论:解释农村产业发展的新视角

贫困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各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减贫。多维贫困的提出为研究贫困与减贫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有研究表明,慢性贫困是贫困现象的重要表征,政府及社会必须在医疗、教育和技术能力上对贫困群体给予相关支持,通过“能力开发”来减缓贫困的脆弱性和长期性^[11]。除此之外,提高农村家庭的资产水平和身份认同能够显著降低贫困的脆弱性。因此,应在促进贫困群体资产的不断积累并提高其运用效率的同时促进其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达到减贫和降低贫困脆弱性的目的^[12]。贫困群体资产水平和身份认同的转变离不开农村产业的发展,产业扶贫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较佳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产业扶贫能显著降低贫困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产业扶贫在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面对一些难以脱贫的深度贫困群体,创新减贫方式势在必行,而创业减贫成为近年来不断实践的新理论热点。

随着减贫实践的丰富,关于创业减贫的文献有了一定的积累。通过对创业减贫文献的梳理,发现可以将文献按照对贫困的定义分为两种情形。其一,从传统的按收入界定贫困标准来看,通过创业弥补贫困人群的资源欠缺可以使其摆脱贫困,现有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创业模式来帮助贫困人群进行减贫。其二,根据多维贫困的概念来进行减贫研究,为解决贫困群体的能力不足^[13]和地域的制度限制^[14]提供解决方案。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补给理论、新BOP模式、本土创业减贫、平台赋能理论、制度变革理论和学习变革理论等方面对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 with 未来方向进行了深入探索^[15]。资源补给理论强调当资源匮乏、供给不足时,资源的汇集和直接供给能够促进创业需求并减少贫困^[16],诸如知识、物质、政治稳定、创业导向等资源是推动贫困人群创业的主要因素。在多维贫困概念提出后,新的创业减贫理论开始出现。新BOP模式将贫困群体重新定义为商业合作伙伴甚至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生产者。在新的定位下,促进政府、企业、创业人员与贫困群体形

成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建立起有针对性的消费市场,成为当前新BOP模式关注的重点方向^[17]。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由于价值链和制度的缺失,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企业建立跨部门价值网络的成败关键^[18]。与外部创业者带动贫困人群减贫的BOP模式不同,本土创业减贫理论强调的是本地的贫困群体基于自身拥有的地域文化,以自我雇佣的方式进行创业并以此达到减贫效果。实际上,本土创业减贫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第一,由于当地文化及外出劳动力不愿意返乡等问题,本地居民并不都愿意创业^[19]。第二,要带动大多数本地居民参与扶贫企业,需要类似“万事通”“新乡贤”之类的引领者。第三,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而忽略外部因素的本土创业减贫并不容易开展,政府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需要发挥作用来引导、创造创业机会^[2],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正体现了政府的引导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精准扶贫政策虽然是由政府主导,但实际上各参与主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贫困群体赋能提供了基础。还有文献基于平台赋能理论分析了数字技术和创业减贫的关系,通过对“淘宝村”的考察发现,“淘宝村”在帮助农民销售产品提高收入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产品^[2]。农产品电商在扶贫中的作用在于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注重渠道的精准性和农户的全方位参与^[20]。同时,创业减贫得益于扶贫制度的全方位变革。这是因为,制度的供给不足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21],政府的治理方式、多方共建具有包容性的产业化区域创新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创业动力和能力^[22]。与此同时,制度变革理论特别强调,创业减贫并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率,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平等^[23]。虽然以上理论与研究能够提高创业减贫的效果,但实际上提高贫困人群的减贫主观能动性、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才是关键,这也是学习变革理论所研究的问题^[24]。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贫困人群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主观能动性是创业减贫的巨大动力^[25]。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创业减贫和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相关研究也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第一,创业减贫前沿理论

虽然给扶贫提供了诸多新方向,但各个分支理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创业减贫和三产融合长效机制还未建立起充分的理论联系。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沿理论,如何将不同的分支理论归纳到统一框架下去分析,关系到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也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基于现有文献的不足并通过文献的梳理,本文将创业企业实践与三产融合看作是一个共演共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企业的实践根植于脱贫攻坚过程中使用的创业减贫理论,在创业减贫理论体系下,创业企业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具体理论进行实践。农村的三产融合沿着“初步融合—深度融合—形成机制”的路径逐步演进。通过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深入挖掘不同创业企业在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创业减贫实践的具体模式并比较其中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农村三产融合的长效机制,以期为进一步落实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及实践思路。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能够有效揭示变量间的新关系、提出新构念,并系统刻画研究对象的动态演进机制^[26]。与单案例研究相比,跨案例研究更有利于辨析不同情境下的异同,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追踪,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理论建构能力,可以具备更高的信效度水平。同时,由于时间脉络与关键时机在社会发展与组织演进中具有重要作用,严谨的学术研究有必要融合时空视角,采用整体性分析框架。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处理跨层次、多阶段、复杂的理论问题^[27]。本文基于研究的核心目标,选择采用跨案例研究设计,并依托扎根理论的分析路径,对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进行编码与归纳,提炼创业减贫与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关键要素的互动关系与演化路径。

在案例村庄的选择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三项原则:第一,典型性原则。所选案例应在创业减贫与三产融合方面成效显著,能够清晰呈现从企业实践到长效机制形成的完整演进过程,

具体模式可有所不同,但应具备较强的代表性。第二,多样性与对比性原则。案例选择兼顾复制逻辑与差异比较,涵盖不同地理区位、创业企业类型及其他参与主体特征,以增强研究的维度丰富性与外部效度。第三,完整性与可及性原则。案例村庄需允许访问核心参与主体,并

支持可能的追踪调研;同时,为满足三角验证需要,案例村庄应能提供较全面的内部资料,确保原始数据的真实性与丰富性。依据上述原则,本研究最终选定贵州省团结村与江西省黄溪村作为分析对象。案例信息见表1。

表1 案例信息

Tab.1 Case information

案例对象	黄溪村	团结村
所处位置	江西省修水县	贵州省遵义市
基本概况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区县、人口大县	革命老区、山区、贵州省深度贫困村
访谈人数	55	37
一手资料	5万字	15万字
二手资料	7万字	9万字
现场观察	村办企业、种植基地、旅游项目、新型社区等	天渠景区、种植基地、旅游项目、新型社区等

2.2 调研过程与数据处理

2.2.1 调研过程

2019—2022年,研究团队多次深入2个案例村庄进行调研,在具体调研中采取了非结构化访谈方法、观察法、田野调查法等方法收集一手数据,通过以上方法,研究团队整理筛选出有效文字记录20万字左右;此外,研究者还收集大量二手资料作为补充,提高案例分析质量,二手资料主要来源于政府文件、媒体报道、会议记录等,共计16万字左右。

2.2.2 数据处理

研究团队对2个案例村庄的资料进行整合、质证,确保其能反映村庄真实情况。首先,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分析并检验理论饱和度;依据“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的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程序展开数据分析。数据处理过程中,严格遵循扎根理论范畴归纳和模型构建步骤对所收集资料加以抽象化和范畴化,保证研究信度和效度。在不断提炼的编码过程中,研究团队也在数据和现有文献之间切换,成为“知识中介人”,通过现有的文献逻辑和理论解释研究资料数据,同时又保持一种批判态度,帮助研究团队洞察数据的内在意蕴。对于在编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逻辑问

题,本研究在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订与删改,尽可能避免编码者的主观性影响,提高编码客观性。

3 案例分析与发现

3.1 发展融入阶段:困境与探索(2013—2015年)

3.1.1 团结村:“外来型”创业企业的现实困局与破局之策

团结村作为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自身产业基础薄弱,脱贫难度较大。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在产业扶贫时需要一个“外来型”企业嵌入团结村进行强有力的帮扶,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天金融)在此背景下响应贵州省政府的号召,入驻团结村开展帮扶。

中天金融入驻团结村初期,除了需应对客观制约,还面临着来自当地贫困群体的信任缺失问题。由于此前部分扶贫企业及项目存在承诺未能落实、帮扶措施虚化等现象,加之村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理解有限,中天金融在推进创业减贫项目之初并未获得村民的充分信任,甚至屡次遭遇村民阻挠施工的情况,中天金融的创业减贫实践一度陷入停滞。

面对上述困局,中天金融转变创业思路,加

强与政府联系并依靠当地新乡贤的威望进行创业减贫实践。首先,推动基层政府制度逻辑的重构。为破解信任危机,中天金融主动开展入户走访,逐步赢得村民信任,初步打开了创业减贫的僵局。同时,政府也积极回应,推进制度创新与项目差异化实施,逐步构建起政企之间制度嵌入与能力互补的协同机制。其次,发挥当地新乡贤的协调作用。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在团结村有较强的号召力。中天金融以乡贤为切入点发展“天渠”景区,在此过程中,黄大发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与宣传中,村民也在黄大发的带动作用,逐步参与到创业减贫实践中,中天金融也逐步实现了信任累积的过程。

此外,中天金融通过补充医疗商业保险,阻断因病返贫;基层政府则通过强化政策宣传,增强村民对政策与制度的认同,这些举措都激发了村民参与创业减贫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除了开展技能培训与发展基础教育,团结村还着重培养新乡贤群体,为长期发展积累人力资本。最后,团结村在多方深度协同下,通过对村内原有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规划,有效盘活农村资产、资源与资金,提升其配置与使用效率。

如上所述,作为“外来型”创业企业,中天金融在外部资源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即便如此,其在发展融入阶段仍然出现了发展困境。如果创业企业的利益诉求与制度逻辑和当地村委、村

民存在矛盾,就会导致其在发展融入阶段的创业效果出现一定的偏差。要解决这一偏差,需要让乡村中具有威望的乡贤从中起到协调作用,团结村中的老支书黄大发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从这一阶段编码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政府乡贤、企业乡贤、企业村民等“多方深度协同”下,企业进行“嵌入型创业”,通过搭建创业平台对产业体系进行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带动村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并逐步获得村民信任,进而通过创业减贫实践显著增加村民收入,个人技能水平明显提高,在身份认同摆脱“贫困群体”标签的同时,“内生动力”显著提高,也进一步实现了初步的“产业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多方深度协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乡村治理体系,并对创业减贫实践和三产融合有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多方深度协同”强调的是在创业减贫与产业融合过程中现有及潜在参与主体的广泛参与。“嵌入型创业”有别于“输血式”扶贫创业活动的被动实践,强调的是不同参与主体深入实践活动本身,根据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协同框架下找到整合点,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为首要目标进行创业实践活动。

团结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汇总和发展路径分析分别见表2和图1。根据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汇总和相关机理分析,得出2个命题。

表2 团结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

Tab.2 The coding in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of Tuanjie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多方深度协同	政府企业协同	创业减贫
		协调机制
	政府乡贤协同	第一书记制度
		精神带动
	企业乡贤协同	基层治理
		人力资本积累
企业村民协同	培养新乡贤	
		带动机制
		信任累积

(续表)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内生动力	提升内生动力	脱贫积极性提高
	身份认同	身份转变
嵌入型创业	搭建创业平台	发展集体经济
	产业体系重构	立体化产业
产业融合	完善产业体系	产业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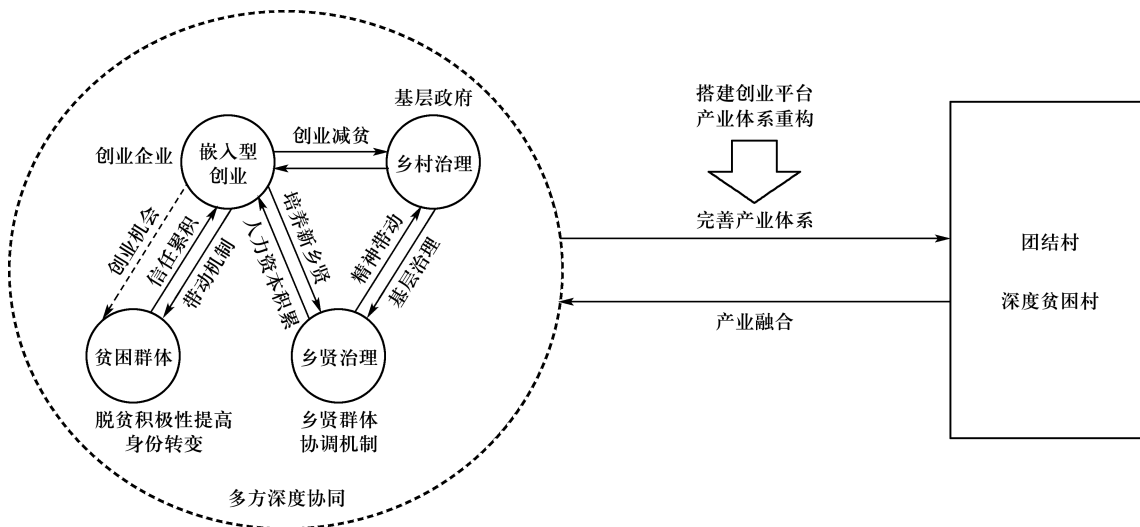


图1 “外来型”创业企业在发展融入阶段的发展路径

Fig. 1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non-local startups in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命题1：“外来型”创业企业在资源方面存在优势，但由于利益诉求与制度逻辑和当地村委、村民存在矛盾，在发展融入阶段会出现一定的预期偏差。

命题2：“外来型”创业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乡贤群体多方深度协同进行嵌入式创业，逐步提高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为创业减贫实践提供优质人力资本，可以为产业融合创造有利条件。

3.1.2 黄溪村：“内生型”创业企业的自适应性发展

黄溪村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修水县的一个村庄，除了产业基础薄弱，还普遍存在赌博、酗酒、打架斗殴等不良现象。与团结村不同，黄溪村选择了“内生型”创业企业来进行创业减贫实践。

在精准扶贫大背景下，优秀企业家徐万年

被选为村支书。徐万年年轻时便在黄溪村担任村干部，此后创业取得成功，成了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企业家。2008年，面对黄溪村的困境和村民的期望，徐万年高票当选为黄溪村支书。随后，徐万年迅速找到黄溪村面临的问题：首先，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不足。留守村民中有不良嗜好者不在少数。其次，产业选择不合理。原来黄溪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村里的产业发展也没有合理统一规划。最后，乡村治理水平落后。黄溪村硬件条件极差，村干部薪资得不到保障，基层治理积极性不高。

面对问题，徐万年把自身乡贤与基层政府的双重身份进行融合，同时发挥自身社会资本优势进行创业减贫实践，实现了政府、乡贤、产业发展多方深度协同，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在扶贫产业发展决策过程中相互掣肘的难题。经过对黄溪村自然条件和周边市场环境的反复调

研及和黄溪村的干部、村民就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蚕桑产业的充分讨论,黄溪村选择了蚕桑产业作为创业减贫实践的发展方向。同时,针对种桑养蚕技术缺乏的状况,徐万年带领着村干部和几名骨干到浙江学习,明确了自己掌握技术创业成功后再指导村民的具体方针。

在发展桑蚕产业时,黄溪村“内生型”创业的优势逐步体现。首先,黄溪村进行资源整合,明确“确股确权不确地”,为桑蚕产业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其次,黄溪村的创新创业模式聚焦于土地制度改革,通过“三权分置”盘活存量资产。再次,改善交通条件。通过修建黄溪大桥,黄溪村与通往修水县县城的国道连通,为后期产业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徐万年带领着村干部等骨干到浙江一些地方学习,引进桑叶品种,回村后对贫困群体进行技术再培训。通过一系列的举措,黄溪村在融入发展阶段产业明晰,发展迅速。桑田蚕业公司的成立标志

着“内生型”创业企业融入黄溪村。

可以看出,与“外来型”创业不同,“内生型”创业在产业发展期的适应性更强。“内生型”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间基于互相信任更容易实现“多方深度协同”,通过赋能快速实现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带动内生动力提升。由于“内生型”创业的天然优势,村庄更容易形成优良的乡村治理秩序并对初期产业融合的进程起到加速作用。

黄溪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汇总和发展路径分析分别见表3和图2。通过以上论述分析,本文得出新命题。

命题3:“内生型”创业在产业发展期的适应性更强,可以有效避免组织与企业间因制度逻辑张力而出现的资源内耗,能够更好地聚集周边优势资源,为产业链升级和三产融合提供条件。

表3 黄溪村在发展融入阶段的编码

Tab. 3 The coding in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of Huangxi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多方深度协同	乡贤政府协同	双重身份融合
	乡贤产业协同	乡贤带动
	政府产业协同	科学决策 指导机制
内生动力	社会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	互相信任 赋能贫困群体
	资源整合	土地流转 交通改善
内生型创业	稳固创业基础	能力培养 资金保障
	乡风文明宜居	摒弃贫困文化 改善村居条件
	产业链形成	产业逐步发展
产业融合	产业链形成	产业逐步发展

3.2 价值赋能阶段: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形成(2016—2020年)

3.2.1 团结村:“品牌”带动三产融合 随着多方深度协同下创业减贫实践的推

进,中天金融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农旅产业共同发展,“外来型”创业企业的创业减贫实践开始进入价值赋能阶段。在经历融入发展阶段后,中天金融仍面临产品结构较为脆弱、加工精

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吸引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为进一步应对蚕桑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销售渠道不稳定等问题,桑田蚕业重点开展蚕茧代收代销业务,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统一收购村民蚕茧,并直接对接外部市场,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最大限度保障村民收益。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桑田蚕业面临蚕茧滞销的严峻挑战。基于多年商业经验,企业负责人徐万年与村集体及养蚕大户协商后,决定向下游延伸产业链,建设蚕丝被加工厂,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进而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与村民收益稳定性。桑田蚕业通过强化产业基础设施、降低村民参与门槛、延伸价值链、稳定原料收购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实现对本地蚕桑产业的系统性赋能。这不仅拓展了村民创业就业空间,也增强了企业的核心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

作为一家“内生型”创业企业,桑田蚕业在价值赋能阶段的减贫实践中,持续推进黄溪村蚕桑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通过建设蚕丝被生产线,企业由原先的外销代理角色转变为原料直接消化者,村民生产的蚕茧全部内销用于深加工,在保障原料销路稳定的同时,也增强了产业链的结构韧性。相比原料销售,蚕丝被等

精加工产品具有更高的差异化和抗市场波动能力,进一步巩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桑田蚕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本地就业创业平台的稳定与村民收入的实质性提升。与此同时,蚕桑产业与黄溪村的水果、茶叶、苗木等其他特色产业协同发展,逐步构建起多业融合、互促共进的乡村产业体系。

团结村、黄溪村两个村在价值赋能阶段的编码汇总分别见表4、表5。从两个村的编码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外来型”企业还是“内生型”企业,都可以基于创业减贫的成果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来看,两种模式都在“自适应发展”下进行“融合反馈”最终实现“三产融合”,虽具体路径存在差异,但是都在新乡贤的协调与引导下实现了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各村产业方向。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新命题。

命题4:在价值赋能阶段,融入贫困村的创业企业在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可以起关键作用。新乡贤在创业减贫实践中作用明显。新乡贤一方面可以修正“外来型”企业在产业发展期的偏差,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引导“内生型”企业沿产业链扩展升级。

表4 团结村在价值赋能阶段的编码

Tab. 4 The coding in the value empowerment stage of Tuanjie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产业升级	提质增产
三产融合		品牌拓展
	品牌创立	
	城乡共益	品牌开发
		需求导向
融合反馈	构筑产业体系	巩固渠道
		多元化产业发展
	效益提升	经济效益提升
自适应发展	社会资本积累	社会效益提升
		强化关系网络
	人力资本积累	持续赋能

表5 黄溪村在价值赋能阶段的编码
Tab.5 The coding in the value empowerment stage of Huangxi Village

聚合维度	二阶主题	一阶构念
三产融合	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基础规划
	降低参与门槛	保障资金支持
		提供技术支持
融合反馈	延长产业链	拓展产业链
	深化产业结构	延伸主导产业
	效益提升	经济效益提升
社会效益提升		
自适应发展	人力资本积累	持续赋能
	社会资本积累	价值共享

3.3 三产融合长效机制运行(2021—2023年)

前面的分析表明,创业减贫实践经过发展融入阶段和价值赋能阶段后,贫困村在顺利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三产融合长效机制。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逻辑起点是不同创业减贫主体间的互动,三产融合长效机制是配置创业减贫资源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三产融合长效机制为置身于其中的创业减贫主体提供各类资源,通过深化三产融合来提高农村的贫困治理能力,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维度上看,“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可以被看作是我国农村产业发展到更高级阶段的产物。这是因为农村产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达成共同愿景(即乡村振兴)的多主体全方位参与和共生、注重社会融入和多元协同,构建起带有外生指导、内生发展、共演修复机制的动态三产融合体系,因此可以采用“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分析范式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创新。

本文将“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定义为,多个有共同愿景的创业减贫主体之间基于资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市场、知识和学习机制等创业减贫构成要素,协同组成一个组织系统,系统成员相互依存、共建、共享、共赢,并且机制具有一定的协同性、多样性、稳定性、动态性和开放性。该组织系统能够确保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能够形成三产深度融合,由此推动乡村

振兴。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如图3所示。

实际上,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创业减贫与三产融合之间理论联系的印证。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建立的基础在于参与主体的广泛性^[28],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创业企业、新乡贤及社会组织、居民、边缘群体、易返贫群体、相对贫困群体等。其中,新乡贤发挥协调作用,与政府和创业企业形成了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保障体系^[2],三者在创业减贫实践过程中能力共演共进,保障了农村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在保障体系的支持下,减贫要素投入贫困村,在外生指导机制、内生发展机制和共演修复机制的作用下,通过自适应发展进行创业减贫实践,最终促进了农村三产融合。该长效机制具有多样性、稳定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征。随着脱贫攻坚的进行,我国农村的三产融合长效机制已经生成、运行并朝着协同、共享和优化的方向不断演进。特别地,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运行涉及参与主体和各减贫要素产生影响的过程及发挥功能的过程。因此,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运行决定于该组织系统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及相互关系,组织系统是保证三产不断融合的基础。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不但可将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的诸多分支理论联系在一起,而且将前文基于文献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了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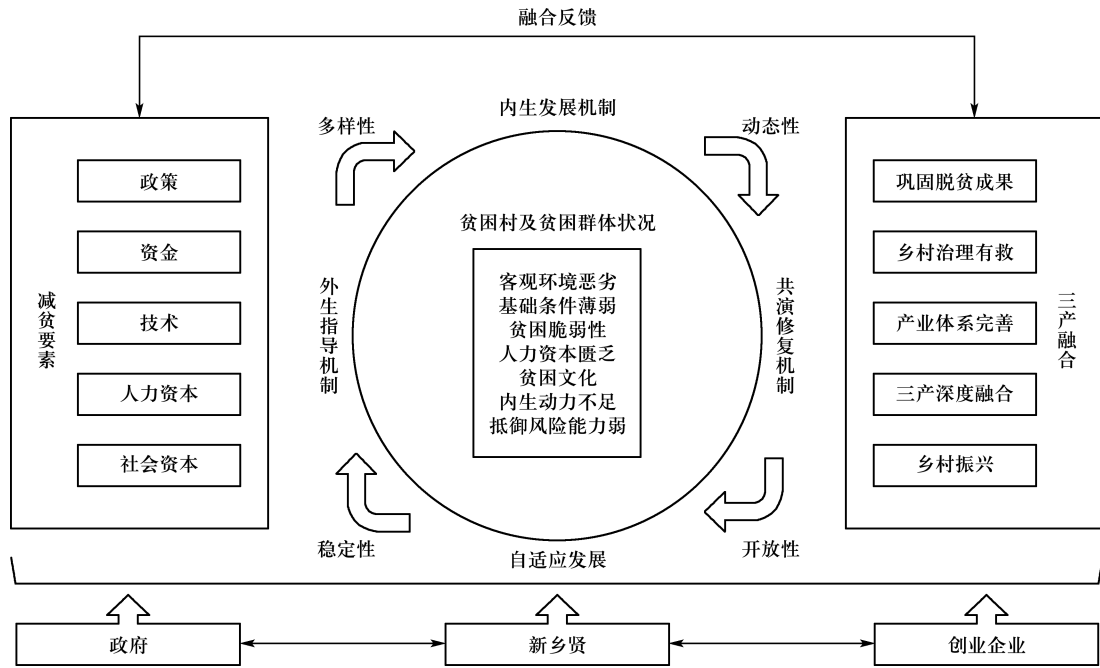


图 3 三产融合长效机制

Fig. 3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创业减贫视角,通过对两个脱贫村创业企业的案例研究,归纳了不同类型创业企业在创业减贫过程中与各相关主体的相互作用,通过产业选择、产业链延伸,推动三产融合长效机制的形成及运转。

第一,“外来型”创业企业在资源方面存在优势,但由于利益诉求与制度逻辑和当地村委、村民存在矛盾,在发展融入阶段会出现一定的预期偏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乡贤的协调作用,在乡贤协调下调和主体之间的矛盾,促进“外来型”创业企业与当地政府、乡贤群体多方深度协同,进行嵌入式创业,逐步提高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为创业减贫实践提供社会资本,可以为产业融合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在价值赋能阶段,融入贫困村的创业企业在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新乡贤在创业减贫实践中作用明显。新乡贤可以修正“外来型”企业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偏差,也可以积极引导“内生型”企业沿产业链扩展升级。

第三,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两种不同创业模式发展的产业都进入价值赋能阶段,并逐步形成外生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制。在外生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制作用下,农村在产业发展上形成了三产融合长效机制。该机制的系统运用可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2 理论贡献

第一,构建了创业减贫实践与三产融合的共演理论框架。不同于既有研究对创业减贫与产业融合的割裂讨论,本文通过纵向跨案例研究揭示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创业企业通过资源补给、制度嵌入和能力弥合等路径推动产业链延伸^[2],而三产融合进程中的主体协同与机制创新又反哺创业减贫实践的深化。这种互动的共演视角突破了传统线性发展范式的局限,为理解乡村振兴中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特别是提炼出了外生指导、内生发展与共演修复三大机制,系统阐释了多元主体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机理,丰富了创业减贫理论的情境化内涵。

第二,提出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双轨驱动”

模型。研究发现,“内生型”创业企业与“外来型”创业企业在产业链延伸中呈现出差异化路径。前者依托新乡贤人脉实现社会资本的内源性积累,后者通过制度改革重构资源分配秩序。两种模式在产业融合中形成互补效应,内生型创业企业的适应性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韧性,外来型创业企业的资源注入加速规模效应形成。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BOP理论与制度创业理论的应用边界,也通过“信任累积—能力共建—价值共创”的演化链条,揭示了中国特色乡村产业振兴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逻辑。

第三,发展了乡村创业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本文采用“时间嵌套式”纵向案例设计,将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与过程追踪法相结合,通过捕捉两个案例村庄关键事件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事件系统理论解析了政策冲击、主体博弈与技术扩散等要素的跨层次联动效应。这种时空维度融合的研究设计,为破解乡村创业研究中的“过程黑箱”问题提供了方法范例。

第四,深化了创业减贫理论的本土化建构。研究发现,乡贤群体在创业减贫中扮演着“制度中介者”与“资源转化器”双重角色^[29]。乡贤既可以通过非正式权威修正外来企业的制度偏差,又可以“新乡贤+”模式重构地方产业网络。这一发现揭示了社会资本在乡村创业中的重要作用。相较于西方语境下的社会创业理论,本文特别强调政治关联与文化资本的独特作用,为发展中国家乡村创业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4.3 实践启示

第一,通过构建多层次主体参与的产业政策框架,强化了制度供给弹性。建议政府将非营利组织纳入农村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其参与产业规划与社区治理。同时,应建立动态政策调整机制,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融合阶段特点,在土地流转、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包中自主选择适配方案。如江西省修水县黄溪村在蚕桑产业链延伸中实施的“技术入股分红”政策,有效解决了技术扩散与利益分配难题。

第二,完善新乡贤治理的制度化路径,构建“双轨驱动”协调机制。新乡贤在产业融合中兼具文化权威与资源整合双重功能。政府的政策设计需着重解决乡贤作用发挥的两大瓶颈:一是建立乡贤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制度,通过设立“乡村振兴顾问委员会”等机构,赋予其参与产业规划、项目评估的权限;二是构建“正式制度+非正式规范”协同机制,将乡贤调解纳入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同时需警惕乡贤治理的风险,通过村民议事会等平台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第三,实施“链式政策”供给策略,推动产业生态系统升级。政策制定应突破单一产业扶持思维,转向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三链协同”的政策设计。具体包括建立产业链韧性评估体系,在项目审批中增加供应链稳定性、市场风险分散度等评估指标,如黄溪村蚕丝被加工厂的逆向供应链建设经验值得推广;创新“共享收益”分配机制,探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技能溢价”复合分配模式,确保小农户深度融入产业链;设立三产融合创新试验基金,重点支持数字技术应用、功能拓展型融合等新业态。

第四,构建“四维赋能”的价值共创体系,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建议从组织赋能、数字赋能、空间赋能、制度赋能四个维度完善政策支持:组织赋能方面,推广产业联盟模式,将基层组织嵌入产业链关键节点。数字赋能方面,将数字乡村建设与产业融合深度耦合,建立覆盖县、乡、村三级的产业大数据平台。重点开发产业链智能决策系统,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实时市场分析、风险预警等服务。空间赋能方面,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设立“产业融合特别功能区”,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优先用于文旅融合、仓储冷链等产业项目。制度赋能方面,建立乡村振兴政策效能评估机制,将三产融合度、农民参与率等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情境适用空间有待拓展。尽管采用跨案例比较方法,但样本均取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其经验在东部沿海或城郊融合型村庄的适用性需进一步验证。

第二,方法论层面有待改进。定性研究虽

能深入揭示机制复杂性,但难以量化不同要素的作用权重。未来可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构建“主体能力—制度环境—产业特性”的多层指标体系,解析三产融合的组态效应;另一方面可以开发微观量表,通过大样本面板数据检验理论模型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 陈锡文,韩俊.农村全面小康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1.
- [2] 李晗冰,王志涛.身份认同、乡村治理与返贫阻断——基于脱贫村创业减贫实践的多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6):77-95.
- [3] 卢京宇,郭俊华.三产融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华东经济管理,2025,39(2):69-79.
- [4] 李晗冰,王志涛,闫静怡.制度逻辑、能力共演化与政企能力重构——基于G省T村的案例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2,36(4):9-17.
- [5] 曹祎遐,黄艺璇,耿昊裔.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对农民增收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2005—2014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2):172-182.
- [6] 王丽纳,李玉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分析[J].改革,2019(12):104-114.
- [7] 万宝瑞.我国农业三产融合沿革及其现实意义[J].农业经济问题,2019(8):4-8.
- [8] 肖婧文,冯梦黎.农村产业融合嬗变:利益联结与生产要素的互动和共演[J].财经科学,2020(9):64-78.
- [9] 郭军,张效榕,孔祥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案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9(3):135-144.
- [11] 张麦生,陈丹宇.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动因及其实现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2020(8):6-8.
- [12] 邹薇,方迎风.中国农村区域性贫困陷阱研究——基于“群体效应”的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2(6):3-15.
- [13] Woodson T S.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A look at nanomedicine for diseases of poverty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7): 1410-1418.
- [14] Williams C C, Martinez-Perez A, Kedir A M.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impacts of starting up unregistered on firm performanc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5): 773-799.
- [15] 斯晓夫,严雨珊,傅颖.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与未来方向[J].管理世界,2020,36(11):194-207.
- [16] Sutter C J, Bruton G D, Chen J.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extreme poverty: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9, 34(1): 197-214.
- [17] Calton J M, Werhane P H, Hartman L P, et al. Building partnerships to create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at the base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pyramid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7(4): 721-733.
- [18] 邢小强,仝允桓,陈晓鹏.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商业模式:一个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27(10):108-124+188.
- [19] 张国庆,斯晓夫,刘龙青.农民创业的驱动要素:基于扎根理论与编码方法的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3):139-148.
- [20] 颜强,王国丽,陈加友.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以贵州贫困农村为例[J].农村经济,2018(2):45-51.
- [21] Saebi T, Foss N J, Linder 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mis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45(1): 70-95.
- [22] 黄承伟,覃志敏.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5):51-55.
- [23] Robson P J A, Wijbenga F, Parker S C. Entrepreneurship and policy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Researching Entrepreneurship, 2009, 27(5): 531-535.
- [24] 傅颖,斯晓夫,陈卉.基于中国情境的社会创业:前沿理论与问题思考[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39(3):40-50.
- [25] Si S, Yu X, Wu A, et 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Yiwu, China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32(1): 119-143.

- [26] Eisenhardt K M, Graebner M E, Sonenshein S. Grand challenges and inductive methods: Rigor without rigor morti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4): 1113-1123.
- [27] 谭劲松, 宋娟, 陈晓红.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 “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 [J]. *管理世界*, 2021, 37(9): 167-191.
- [28] 李哈冰, 李钢. 合供视角下城郊村的更新与治理——基于扎根理论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6): 116-129.
- [29] 李华胤. 乡贤、村治与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3): 67-84.

How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hape Sustained Mechanism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hree Industries: A Cross-case Study Based on Two Modes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XIANG Wei-li¹, LI Han-bing², ZHAN Wang²

(1. Library,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has reached a preliminary scale, but still suffers from systemic deficiencies.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three industries”) with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thus, becomes crucial to addressing this issue.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villages with distin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ural triple integration, analyzing the behavioral roles played by both “non-loc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actors involved. The study finds that, compared to non-local enterprises, local enterprises are more readily integrat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stage, facilitated by accumulated trust. Local elites play a dual role and help correct deviations of non-local enterprises while guiding them to expand and upgrade along the industrial cha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oth entrepreneurial models enter the value empowerment stage, gradually forming three core mechanisms, that is, exogenous guidanc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 Driven by these three mechanisms, a sustainabl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ural three industries’ integration takes shape. This provides a robust foundation for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effectively aligning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driven poverty reduc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long-term mechan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武 爱]